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学科建设丛书

中国共产党 思想史

刘华清/张检明/主编

中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

刘华清 张检明 主编

中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

刘华清 张检明 主编

☐责任编辑 周兴武

☐出版发行 中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长沙市麓山南路 邮编:410083

发行科电话:0731-8876770 传真:0731-8710482

电子邮件:csucbs@public.cs.hn.cn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装 长沙市文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5 ☐字数 267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61-581-5/D·056

☐定 价 19.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请与经销商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1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与马克思主义	10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特点	19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上）	24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萌芽	24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基本形成	28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进一步探索	32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成熟	47
五、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继续发展	55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下）	60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基本内容	60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特点	84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历史地位	91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	93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产生的理论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	

.....	93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的提出	97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的主要内容	103
四、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的历史地位	122
五、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的嬗变	128
第五章 社会主义改造思想	133
一、社会主义改造思想提出的历史条件	133
二、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的提出	139
三、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的主要内容	146
四、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的历史地位	162
第六章 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上）	168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168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	178
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错变	201
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评价	207
第七章 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下）	212
一、“文革”期间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迷误	212
二、党对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在曲折中发展	230
三、对党在“文革”期间探索社会主义思想的评价	240
第八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	247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初步提出	247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形成	261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成熟	272
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继续丰富和发展	279

第九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	293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 条件	293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299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	306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 新阶段	312
后 记	324

第一章 导 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呼唤中诞生了。从此，中国革命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28年，取得了民主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了历史新纪元。随后，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又进行了29年的探索和实践。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24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中华民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伟大的实践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和思想产生的基本条件。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主观臆想的结果，它有自己的历史渊源和理论来源。也就是说，它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共产党正确思想的直接理论源泉。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长达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延续五千年而经久不衰，其间虽有起伏跌宕却未中断过。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惟一没有被割裂历史的国家。中华民族文化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杰出的。在一个幅员辽

阔、民族众多的国度里能保持长期统一，其文化传统不发生断层，这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少见的，其中蕴涵的无比高尚的民族精神和异常坚固的民族凝聚力，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长河里，涌现过像屈原、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他们璀璨的诗篇，不仅在中国脍炙人口，而且令世界友人为之倾倒；涌现过像老子、孔子、庄子这样的伟大思想家，他们精妙的哲理，至今孕育中国人的智慧；涌现过像祖冲之、张衡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的伟大发现曾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涌现过像秦始皇、唐太宗、成吉思汗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他们的文治武功，不仅令后人敬仰，有的甚至影响当时的世界；涌现过像孙武这样伟大的军事家，他们的思想不仅为当时的军事提供了谋略，而且成为当今经商致富的思路。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引以自豪。

给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下一个科学的定义是完全必要的。所谓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就是指氏族社会晚期到五四运动前上下五千年在中国范围内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文化。“文化”这一词在我国古已有之。《易经》中有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即指诗书礼乐、人伦道德，“化成”则指教化、化生、变化和造化之意。可以认为，这里已经蕴含了“文化”的基本含义，即与武力相对而言的文治教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经历了生成、发展、成熟和转化等时期，构建了无以伦比的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它具有独创性和兼容性、悠久性和内聚性、统一性和多样性等特点。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基本精神包括：第一，“人文精神”，即：它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这种“人文精神”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美德：积极进取、坚忍不拔、敬老养老、救济孤残、勤俭治家治国等等。这些美德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古代“人文精神”中的精华。第二，“自然精神”，即：天人关

系。传统文化强调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不能破坏自然，主张天人合一。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人可以认识、保护和利用自然；另一方面又将自然神化，从而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屈服自然。这种“自然精神”对后人产生双重效应。第三，“奇偶精神”，即将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分成阴阳对立的两个方面，用阴阳来解释自然和人事变化的同时，又在数字的计算方面提出了“偶”与“奇”的概念。奇与偶的分离和结合，是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征。从这里展开了异常生动活泼和丰富多彩的理论思维活动，于是相生相克、抑损举补、安危、动静、左右、上下、盈缺、贵贱、情思、知行等等相对的概念便应运而生。第四，“会通精神”，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国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同时也吸收了外国的优秀文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文化，她善于学习各种文化体系的长处，又能加以消化吸收，用以丰富自己。这就叫做“会通精神”。这些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点。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有其不足，甚至还存在一些糟粕，对此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水平的提高，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条件。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生长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氛围中任何人都无不受这种传统的熏陶和影响，中国共产党人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哺育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

如何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作出的正确回答。中国近代史上曾有许多人作过有益的探索，并且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提出，应当发扬

我国固有的文化，同时吸收世界的文化。这些对中国共产党人有巨大的启发意义。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认为，中西文化互有长短，应当时时加以调和与融合，以创造出新文化的生命。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论述最充分和精辟的是毛泽东。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作为民族的文化，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毫无疑问，对于外国进步文化应当大量地加以吸收，但是这种吸收不应当是生吞活剥、毫无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如同食物一样，只有经过我们自己口腔和肠胃的运动，排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才能有益于身体。毛泽东明确反对全盘西化，强调外来文化只有与中华民族特性相结合，才能有生命力。作为科学的文化，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必须作一番清理，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既不能搞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引导人们向后看，也不能割断历史，搞民族虚无主义。后来，毛泽东明确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加以批判地继承、接受祖先留给我们民族的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品格，对中华传统文化采取科学的态度，使历史的珍贵遗产为正在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与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其中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这是不容置疑的。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从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吸取哪些养分。

第一，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继承了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凝结、积淀起来的对祖国最高

尚、最神圣的民族感情。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发展和强大，不计个人利益，无私无畏随时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无论祖国是在危难中，或是富强时，都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把祖国的兴衰荣辱永远和自己的命运连在一起。祖国危难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虽九死其犹未悔”；祖国富强时，无私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爱国主义传统早已深深地融入了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的民族魂和国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中国共产党产生于灾难深重的 20 世纪初。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中国共产党人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把全国人民团结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领导人民艰苦抗争，不怕牺牲，浴血奋战，打败了帝国主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尊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爱国主义旗帜下，中国人民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战天斗地。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无数留学国外的学生和侨居海外的同胞回到国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当时的条件是那么困难，但是再大的困难也不倒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把国家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第二，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继承了改革精神。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改革精神十分丰富。从上古到西周，就萌动了改革思潮。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开始改革，随后引起连锁反应，郑、吴、越等国相继进行了改革。战国时期，出现了改革热，李悝在魏国对政治大胆创新，吴起的军事改革给后人留下丰富的遗产。更值得一提的是商鞅变法。正是商鞅变法的成功，才促进了秦国的崛起，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有作为的政治家无不企图通过改革来稳定自己的政权。刘

邦初定天下，汲取秦朝灭亡的教训，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旷世伟才李世民针对隋朝时弊进行了循序渐进、富有成效而稳妥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为他的成功创造了前提。北宋时期，在内忧外患面前，改革家范仲淹推行以整改和恢复政权机能为主的改革新政，虽然在守旧派官吏的反对下而失败，但它为20多年后王安石更大规模的改革开拓了道路，提供了可贵的借鉴。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进行了广泛的、全方位和多层次的改革。这次改革对宋朝走出困境有一定帮助。王安石作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而彪炳史册。元朝的张居正破釜沉舟式的改革锐气为后人所赞颂。清朝的康乾盛世都与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进入近代，又有洪秀全的改革新模式，戊戌变法时期的改革浪潮，辛亥革命时期的推翻帝制建立新型的国家政权，等等。中国历史的一系列改革为改革思想提供基础。而纵观中国历史，改革思想又异常丰富。《易经》说：“变则通，通则久。”商鞅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吕氏春秋》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龚自珍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变易。”梁启超说：“中国之当改革不待言矣。”这些改革先驱奔走呼号，都在于警醒国人，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些改革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改革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人从传统文化中吸收改革意识，在民主革命时期，为打破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奋斗了28年。建立新型人民政权后，又不断推进改革实践。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中，改革意识非常浓厚，改革的理论非常丰富。这些不能说是传统文化中改革意识的简单移植，但它的确同传统文化中的改革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这样说，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思想与理论是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总结，同时，它受到传统文化中改革意识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第三，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继承了民本意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非常丰富。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提出治国的根本是“足食、足兵、民信”。孔子提出，民以食为天，兵不可一日无食。足食，就是国家要有足够的粮食。足兵，就是有强大的军队和充足的军备。民信，即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拥护。为政者只有取信于民，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把国家治理好。这三个方面都重营，但民信是立国之本，若失去民信，一切都无从谈起。二是国家的兴亡取决于民心向背。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民者而为天子。”孟子把人民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要王天下，首先要争取民众。孟子从商纣灭亡的教训中得出结论：失民心者，失天下。三是重视民事。这里的民事，主要是指农事。儒家文化非常重视农业，并且提出许多发展农业的具体办法，如“不违农时”、“薄其税赋”、“制民以产”。四是与民同乐。孟子认为，只有与民同乐，才能得民心；只有与民同乐，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如何做到这一点，这就需要“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五是在制定礼法时，既要求人民做到，也要求统治阶级做到。六是在选人用人问题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认为统治阶级不能主观武断，必须以众人的意见为准。孟子说：“国君进贤，左右曰贤，未可也，诸大夫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这些民本意识或民主思想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虽然我们不能说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就是直接来源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但它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不可置疑的。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特别强调必须密切党群关系，党与人民是鱼与水关系。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战胜了困难，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我们进城后，不能当官做老爷，而是要继续当好人民的公仆。邓小平提出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江泽民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标准之一；提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些重要思想的提出，无不说明中国共产党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了民本意识中的合理成分。当然，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中国共产党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正是这样，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强调要反对封建主义，这说明党的领袖们具有战略家的眼光。

第四，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继承了治国理念。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治国之道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孔子到后来的大儒，都有一套治国理念。主要包括：

一是治人必先正己。历史上有政治头脑、有远见的治国者，大都是严于律己，实行爱民政策，把国家治理得太平富强；只有那些昏庸无能的治国者，才大都是实行暴政，放纵自己。根据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孔子提出，“己不正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其人”，“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治人必先正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历代统治阶级的忠告。

二是治国必先实行德刑结合的治国方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主张，在治理国家时，既要讲德治，又要讲刑治。所谓德治，就是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用各种礼仪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刑治，就是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和严刑峻法去管制人们。只会使用一种手段来统治国家的统治者不是一个好的统治者，只有善于运用两种手段才是好的统治者。到宋代朱熹提出，德治治本，刑治治标，不可倒置，也不可偏废。

三是治国必实行任人惟贤的组织路线。孔子在分析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国家灭亡的原因时就认为，这些国家为什么灭亡，就是用人不当。他说，一些国家为什么灭亡，原因是“尊贤而不能用贤也，贱不肖而不能去也”。孔子进一步分析：“贤者知其不用己

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贱己而仇之。贤者怨之，不肖者仇之，怨仇并煎，焉能不亡。”孔子提出了选人的标准，他说只有尊五美、屏四恶的人才能有从政的资格。所谓五美，即“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给人民带来实惠，而不浪费人力物力；不误农时，保证人民不产生怨言；有仁爱的思想而不贪财物；对不同人都要泰然处之，既不骄傲又不怠慢；讲求仪表而不凶猛）。屏四恶，就是摒弃四种有害于人民的做法，即不教，平时不加强对人民的教育，当人民犯了罪时就杀人；不戒，即事先不告诫人民，等到人民出了差错时，就训斥人民；不令，即迟迟不下命令，人民无所适从，老百姓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又加罚老百姓；不给，即出现天灾兵乱时，不发给老百姓物资，让更多的人死去。孔子认为只有符合这两个方面的条件，才有从政资格，也才能从好政。此外，儒家思想还有一整套办法，如何选人，如何用人，如何使人群而不党。

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念，较多地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非常善于从中国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他经常从历史典故中得到启发。他从严要求自己；他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他提出了任人惟贤的组织路线，等等。邓小平以其钢铁般的意志，实现拨乱反正，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伟大任务，在党的组织路线实现重大改革，等等。江泽民同志在新时期思考最多的问题是党的建设问题，制定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略。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共产党人从传统的治国理念中采集合理成分，并与当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促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欣欣向荣。

第五，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继承了传统美德。我国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有丰富的历史遗产，其中包括不同时期关于伦理道德学说的理论，以及种种道德规范。孔子提出“仁者爱人”，还提出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等道德规范，把做人的道德品格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强调舍生取义。中华

民族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上多次复兴，产生了很多民族英雄，他们的正气与操守千古不朽。南宋时的民族英雄在狱中始终不屈，所写的《正气歌》一开头就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认为有了这种浩然正气，就会把生死置之度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岳飞英勇抗金、郑成功光复台湾等都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和高风亮节。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还包括尊师敬老、救济孤独残废、移风易俗等。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党内或革命队伍中所出现的先进道德人物和他们先进的道德品质，就是把古代的传统道德转化为新型的思想道德品质，为伟大的事业服务。中国共产党人提倡的爱父母、爱学校、爱家乡、爱社会、爱集体、爱国家、爱社会主义，正是传统美德与新的历史任务的完美结合。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先烈视死如归，用生命和热血换来了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无数英雄人物用智慧与汗水争取祖国的繁荣昌盛。当然，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美德不是简单地复活，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升华。但不管如何，传统美德是今天社会新型道德的基础。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像一座十分富有的金矿，等待着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去开挖。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地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有价值的成分，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思想，不断地使古代传统文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可以这样

说，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发展史，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国国情，认识中国革命规律的历史，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中国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很长的时间内，曾经领导世界发展潮流，是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是，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开始落后了。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外国列强的入侵是落后的根源。按照当时的说法，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甘沉沦的中国人民奋起自救。在自救的过程中，中国人民首先遇到用什么样的思想武器来指导的问题。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武器有封建主义的，也有资本主义的。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运用宗教来唤起和组织农民。实践已经证明，宗教虽然在斗争之初也能当作思想武器，但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宗教不仅不能进一步动员农民，反而成为了一种毒素，成为了捆绑人民手脚的绳索。宗教最终葬送了太平天国革命。随后，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使用的武器都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应该说，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比起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要先进得多，但它又在封建主义而前显得苍白无力，不可能指导解决中国的问题，戊戌变法的失败和辛亥革命的结局，就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思想武器来指导人民的救亡图存斗争，这是一个长期困惑中国人民的问题。正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但直到 20 世纪初才传入中国。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本身先需要在西方本土上进行实践，然后才向其他地方传播。当中国具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土壤、气候、环境后，马克思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来。五四运动前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冲破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束缚，为新思想的传播扫清了障碍。随后，各种挂着新思想招牌的思潮蜂拥而至。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思想中的一种传播到我国。如果说其他所谓新思潮只是昙花一现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则以其强大的